

公寓中的零餘者／浪人／漫遊者： 五四小說的北京書寫*

郝譽翔**

〔摘要〕

本文透過 1920 年代知識分子在北京城市居住空間的轉變：從「會館」到「公寓」，探究科學制度衰亡之後，於民國初年新崛起的文人，如何以新式大學乃至大學周遭的學生「公寓」為根據地，從事文學創作乃至傳播現代新思潮，並從中孕育新的都市感性和生命美學。「公寓」空間往往是新青年們個人生命投射的所在，如郁達夫、林如稷、丁玲、沈從文、胡也頻、盧隱等，也因此成為五四小說中北京書寫頻頻出現的重要主題。閉鎖在公寓中的主人翁們，總偏愛自比為是「零餘者」，或是徘徊在城市的異鄉人，而他們走出公寓，在胡同和公園焦慮遊走，與周遭格格不入的孤獨身影，組合成了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第一批的城市漫遊者。於此可知二十世紀之初北京的城牆瓦解，城市空間從此走向自由開放，遂成為中國新青年重要的啓蒙之地，也為現代小說打開新的一頁。

關鍵詞：五四、現代小說、城市、北京

*本論文係國科會補助 NSC -101-2410-H-194-101-專題研究計畫案執行成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收稿日期：2014年3月27日，審查通過日期：2014年6月9日

一、從「S 會館」到「S 公寓」

1922 年，26 歲的郁達夫結束了長達十年之久的日本留學生涯，回到中國。那時的他已經出版《沈淪》，也已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在東京成立創造社。在《沈淪》這本成名作之中，郁達夫塑造了一個具有強烈的自傳性色彩，並且形象貫穿他日後大多作品的主人翁：一個「被高等教育割勢後的我這零餘者」，¹而這「零餘者」不僅無家，甚至無國可歸，「一生就只能為 wanderlust 的奴隸」，淪為人生路途上「一個永遠的旅人（An eternal pilgrim）」。²

郁達夫所刻畫的「零餘者」和「永遠的旅人」形象，對於當時的中國青年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一時之間，其聲勢竟儼然壓倒了五四時期的另外一個重要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

然而 1922 年郁達夫親自來到北京：這應該是生長於中國南方浙江富陽的他，第一次踏入北京這座古老的北方帝都，他才真正有機會與當時中國頂尖大學的知識青年們，有了第一次近距離的接觸。於是他寫下了〈血淚〉這篇小說，而這也是他第一次以北京，並非東京或上海為背景的作品。在〈血淚〉中，郁達夫毫不掩飾他對於五四青年的懷疑，疏離，甚至淡淡的嘲諷之意。小說的場景聚焦在北京專門出租給學生的「S 公寓」，就在公寓中，他邂逅了一批受到新式大學教育和五四思潮洗禮的青年，他們蝸居公寓，在此聚會，漫談各式各樣的主義，從共產主義，世界主義到「有血有淚」的人道主義都有，而個個頭銜皆是無所不包，但卻令留學東洋多年的郁達夫啞口無言，只能暗地裡怨恨自己：「何以會笨到這步田地，讀了十多年的死書，我卻一個徹底的主義都還沒有尋著，罷了罷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總不合於中國的社會的。」³

〈血淚〉的主人翁只能悵然地走出公寓，獨自漫遊到荒廢的圓明園，看了一宵月亮，還染上風寒大病一場。「S 公寓」和在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所摧毀的「圓明園」，遂在小說中形成了兩個值得玩味的對比：前者是匯聚了受現代教育啓蒙的新青年，而後者則是被現代船堅炮利所摧毀的舊中國；前者是熱情擁抱各式西

¹ 郁達夫：〈寫完了《蕩蘿集》的最後一篇〉，《郁達夫小說全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 年），頁 818。

² 郁達夫：〈懺餘獨白〉，同前註，頁 832。

³ 郁達夫：〈血淚〉，同前註，頁 169。

方舶來的思想，生氣蓬勃，而後者卻是嘗試將西方元素融入中國傳統之中，但到最後只淪為一片荒煙蔓草，斷井頽垣。郁達夫透過「S公寓」和「圓明園」的對比，巧妙的暗示了他對於西方乃至五四現代化的不信任感，批判以及格格不入。

雖對於新中國感到強烈的疏離隔閡，但郁達夫仍以他敏銳的感性和觀察力，寫下了這篇聚焦在二〇年代之初北京城市「S公寓」的〈血淚〉，以此來管窺新／舊時代的變異，以及成長在二十世紀之初，堪稱是中國第一批現代青年的生命狀態，也因此成為了五四小說中書寫城市，乃至公寓空間的先驅者。這批新青年的處境與〈沈淪〉的主人翁相當類似，都是遠離自己原生的故鄉，而以異鄉人之姿，漂泊到大城市中，寄居在狹小簡陋的公寓，而在這個家國瓦解，新的秩序尚未來得建立的時刻，這些青年對於個人前途，國家未來，皆感到茫然失依，無可把握，故一個個東奔西走，正如郁達夫所自稱的「零餘者」。

如此青年「零餘者」在二〇年代初的中國如此之多，就在郁達夫旅居北京時，他接到一位無名小卒的來信，同樣遠離故鄉，因受到五四新思潮的感召迢迢來到北京，也同樣棲身在寒愴的學生公寓裡。郁達夫接到信後不僅親自到他的公寓登門拜訪，還寫了一封長信回覆，發表在《晨報副刊》，信中郁達夫以「一半去勢的文人」來稱呼這位青年，形容他是陷落在故鄉與城市夾縫之中，後退不得，卻又前進不能，成為「一半去勢」的青年。⁴

而青年便是日後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沈從文。而郁達夫親自造訪過的公寓，則被沈從文命名為「窄而霉小齋」。沈從文沿襲的是中國文人的傳統，為自己的書齋命名，並以此來作為一己人格的象徵，如梁啟超便將寄居過的北京新會館名為「飲冰室」。然而，沈從文沒有如此的從容閒情，公寓名為：「窄而霉小齋」，不無嘲諷之意，「窄而霉小」也傳達出新時代青年作為「去勢的文人」的困境：陷落在新／舊、現代／傳統、城市／故鄉夾縫中的隱喻。

在「窄而霉小」的公寓裡，沈從文不僅結識郁達夫，還有許多一樣漂泊北京的青年，如丁玲、胡也頻、陳翔鶴等等，他們一起創辦刊物，實踐寫作的夢想，也從而開啓了五四文學的新頁。這段青年歲月影響沈從文是如此之深之遠，以致他晚年時，都還不禁要回憶道：不是圍牆內的大學，而是圍牆外的學生公寓，才是二〇年代北京最具有活力的空間。

至於郁達夫〈血淚〉中的「S公寓」，究竟位在北京何處？已不可考，但「S」

⁴ 見郁達夫：〈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晨報副刊》，1924年11月16日。

之名，卻也讓人不禁要聯想起魯迅《吶喊》序言中的「S 會館」。所謂「會館」，乃是明清以來各地世子進京趕赴科舉的住處，通常是以同鄉作為單位而設立，大多集中在北京外城的宣武區一帶，已有數百年的悠久歷史。魯迅筆下的「S 會館」，亦即是「紹興會館」，就位在宣武區的南半截胡同內，然而二十世紀科舉廢除，民國成立，會館也就逐漸沒落荒廢。當魯迅 1918 年居住在此時，會館瀰漫的是一股死亡的氣息，宛如是舊中國：一間無計可以打破的「鐵屋子」的轉喻。就在 S 會館，魯迅寫出了〈狂人日記〉，發出現代小說的第一聲吶喊，也代表一個舊時代結束而新時代從此開啓。

1920 年代前後，會館衰敗凋零，取而代之的，便是因應新式大學（如北京大學）設立，而在大學的周遭宛如雨後春筍興起專門出租給學生的公寓。這些學生公寓位在北京的內城，尤其大多環繞著北大，也就是散佈在紫禁城的北河沿到沙灘，馬神廟一帶，因此形成了一塊孕育五四知識青年的沃土。如此一來，從 1918 年魯迅寫下〈狂人日記〉的「S 會館」，到 1922 年郁達夫〈血淚〉中所描寫的「S 公寓」，才不過短短四年的時間而已，但其中北京城市空間，乃至知識分子生活形態的轉折，卻已頗堪玩味：它已從位居於外城以同鄉為單位的、屬於傳統科舉文人的「會館」，轉移到內城以現代大學為核心的、新一代青年聚居的「公寓」。「公寓」也成為五四小說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空間。

換言之，從「S 會館」到「S 公寓」，不僅標誌了五四青年生活空間，乃至思想養成與傳播的轉變，也標誌出北京這一座城市的空間，已經揮別昔日的封建帝都，而邁入一座屬於現代公民大眾的城市，故從傳統的內城／外城，皇權／平民壁壘分明的格局，轉而走向了開放，混合與交融。不論是皇家空間：貴族專屬的園林（如北海公園、中山公園），以及府邸（如乾隆的四公主府改建為北大）的——釋放，到區分貴族／平民與滿／漢的城牆，一一被推翻拆除，皆使得北京城市在二〇年代之後呈現出一個階級崩解，界限渾沌而混亂的狀態，就像彼時漂泊北京的台灣青年張我軍所言的：「亂都」。而這些青年生活在「亂都」之中，行走在「亂都」之間，對於晚清以來知識分子所熱衷探討的「群」與「己」，乃至國家與民族等等課題，也因此產生了更為開放的想像，甚而醞釀豐沛的顛覆潛能。

微妙的是，北京這座「亂都」的命運，更彷彿與這些來自異鄉的「零餘者」交相呼應。不僅是有形的城牆到無形的階級和思想，皆被陸續推翻打倒，以致於城市空間處於前所未有的大開之中，而蝸居在出租公寓的青年，生命也宛如這座城市一般脫節失序。這大抵出於以下的兩種原因，其一，公寓的青年絕大多數是

從外地而來，例如沈從文、丁玲等等，他們既缺乏家中的經濟支援，更沒有正式文憑，故不得大學的窄門而入，只能成為體制外的旁聽生。其二則是，即使擠進大學，但二〇年代後北京因為軍閥統治，也多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下，故大學積欠教授薪餉，學運罷課風潮不斷，而大學生畢業之後，若是沒有人際關係的奧援，亦苦無謀生的出路。所以這批北漂的青年們，就如同自己腳下的這座北京城，不僅與過去的歷史／家族，以及地理／故鄉皆斬斷了連結，而且也缺乏體制：大學或家世背景作為保障，只能淪為一個個漂泊邊緣，貧無立錐之處的中國波西米亞人，「零餘者」，或是沈從文自嘲的「浪人」。⁵

這或許可以說明五四之後，為何是創造社和郁達夫，而不是人生研究會更能夠攬獲這批青年們的心。正如同沈從文的回憶，那時節的文學風氣：「正是文學研究會的莊嚴人生文學，被創造社的浪漫頹廢作品所壓倒」。⁶他自己也坦言，在二〇年代影響知識青年更大的，恐怕是「郁達夫式的悲哀」，而非魯迅，因為魯迅的憂鬱是來自於故鄉的，而郁達夫卻「只會寫他本身，但那卻是我們青年人自己。」⁷故青年們通過了郁達夫小說中反覆出現的「零餘者」，「wanderlust 的奴隸」，以及「一個永遠的旅人」的形象，再三印證了孤獨流浪，被體制所賤斥的自我。而這「零餘者」，「旅人」乃至「浪人」，則更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知識分子的典型「多餘的人」（Lishnijschelovek），例如屠格涅夫的代表作《羅亭》中的主人翁羅亭，他能言善辯，充滿理想與熱情，但卻注定在現實的體制之中處處碰壁，不安其位，不得其所。

二、公寓空間：個人生命的投射

當胡適在定義五四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成績時，他特別將所謂「人的文學」定義作是「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因此造就了一個「個人解放的時代」。⁸然而

⁵ 沈從文〈致唯剛先生〉一文中自嘲自己的小說是「一個高小沒有畢業的浪人作品」，並且對於大學生「以改良社會為己任」、「談政治，討論婦女解放」的使命感，語多嘲諷。見沈從文：〈致唯剛先生〉，《沈從文文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十一卷，頁40。

⁶ 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81。

⁷ 沈從文：〈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頁208。

⁸ 胡適：〈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收於李敖編：《胡適選集》（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年），

「個人主義」乃是從理論的角度詮釋之，若是回到實際生活，北京公寓中的青年不也正是被家庭，學校乃至社會體制所放逐，而淪為一個個「零餘」的「個人」，甚而「浪人」？故理論與現實究竟何者為因？何者為果？正如普實克（Jaroslav Prusek）指出：五四時期中國現代文學之所以突出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乃是因為對於存在充滿了悲劇性的感受，以及自我毀滅的傾向；而此一傾向乃在清代就已經萌芽，那也正是中國封建制度逐步瓦解的徵兆。⁹如此一來，五四小說之所以頻頻出現「零餘者」或是「浪人」，是否也說明了當體制崩潰，國家已不再是凝聚認同的對象，而傳統文人所依附的科舉制度和儒家道德體系，也面臨摧枯拉朽的危機之時，新一代知識青年所面臨的精神困境？

故審視二〇年代之初的北京城市變化，以及生活其中的青年們，將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認識五四的「個人」形象之意涵。趙園《北京：城與人》便指出，五四文學中「寫北京的小說不少，卻殊乏京味。」¹⁰但究竟何謂「京味」？或許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來，二〇年代北京的「京味」，正在於它「殊乏京味」，因為它乃是一座由異鄉「零餘者」，以及大小出租公寓所堆疊而成的城市，而他們的「殊乏京味」，也正顯現出二〇年代北京城市開放的容納與活力，使得浪遊其中的異鄉青年們每每可以跨牆／越界的叛逆之姿，穿梭在昔日的宮闈禁地，並且緊鄰著紫禁城的護城河邊上而居。而青年可以如此堂而皇之進入內城的核心，自由居住行走，傳播思想和籌辦刊物，也可以說是北京自從明清以來，甚至直到今日，在城市空間的發展史上，皆是於一段絕無僅有的，威權消弭，自由開放，並且容許異質聲音並存的時期。而這也才真正釋放了一座城市的現代性與創造力，必然給予了當時的五四青年們一種全新的家國想像，一如日後他們所大膽提出來，甚至身體力行加以實踐的，種種主義與家國方案。

1922年甫從日本歸國的郁達夫，畢竟是北京「S公寓」的局外人，對於五四青年雖感到隔閡疏離，但他已早熟且敏銳地預感到，在公寓青年之中喧嚷的各式各樣的「主義」，雖是無根的浮萍，但又彷彿聞一多所言的「死水」，撥開浮萍後便會驚見底下孕育無限的生機。郁達夫雖然只在北京短暫停留，但他播下郁達

第四卷，頁97。

⁹ 見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usek）著，李燕喬等譯：〈中國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3。

¹⁰ 趙園：《北京：城與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5、270，指出：新文學史上寫北京的小說，也往往沈湎於古城悠然的日常節奏，而冷落了現代的北京變貌。

夫式的「零餘者」的種子，卻已然行滿京華。從淺草社、沈鐘社、沈從文、丁玲、胡也頻、老舍、盧隱等等，這些青年們皆是以公寓作為土壤，而以各式的主義思想作為雨水，在北京城中餵養孵化，於二〇年代中葉長出了各自不同的根芽與花苞。

首先繼郁達夫之後，描述北京公寓青年圖像的，便是淺草社的發起人林如稷。林如稷本是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後追隨陳翔鶴等好友來到北京。彼時的北京因為大學之故，似乎更能匯聚有志一同的青年。從此，淺草社乃至沈鐘社便以北京作為重心，而成員除了林如稷，還有陳翔鶴、陳煒謨、馮至、廢名等等。他們的文風明顯受到創造社影響，卻仍然被魯迅賦予高度的評價。在《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魯迅便選入七名淺草社員十二篇作品，並在〈序言〉中將淺草社定義為：「為藝術而藝術」的社團，這已指出他們的文學信念，究竟傳承自何方？但魯迅依舊高度肯定淺草社的成績，而指出：「（淺草社）向外，在攝取異域的營養，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見心裡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至於淺草社的延續者：沈鐘社，則更被魯迅讚譽為：「是中國的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¹¹

在入選《新文學大系》的淺草社作品之中，林如稷寫於1923年的〈將過去〉是值得注意的一篇。〈將過去〉延續典型的郁達夫式文風，以自傳性口吻，鋪陳一名北京公寓青年的心靈困境，而他不斷在上海和北京兩座城市之間來回奔走，惶惶不知所終，最後只有北京的公寓，才是他身心唯一的歸屬。在林如稷筆下，公寓已不再是一座實存的物質空間而已，而是轉化成為抽象的感官與心理空間，一座由夢境，死亡，酣睡交織而成，情慾沸騰的超現實場域：

這家公寓專供學生住宿的房間。天井裡，不要說是一根青草找不到，還有許多堆積的泥土，渣滓。禽群有時也在隔鄰的一枝很巨的樹杈上乾啼幾聲，綠葉也有時伸過頭來向這邊俯看。臥室的窗上，不同色的紙，糊在那粗細不勻而灰垢佈滿的雜亂格子上面，正好像一副瘦死的屍體，只有慘色失潤的皺膚，包在那如亂棘叢荊的枯骨上；有時風吹過，窗上簌簌作響，更像活屍的慘笑和呻吟聲。¹²

¹¹ 魯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台北：業強出版社，1990年），頁5-7。

¹² 林如稷：〈將過去〉，收於魯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台北：業強出版社，

綠葉的「俯瞰」，窗紙如死屍「慘色失潤的皺膚」，風吹窗如「活屍的慘笑和呻吟」，皆可見周遭的事物被擬人化，而種種動作，聲音和色彩，則組合成一幅驚怖的圖像，成功營造出充滿死亡威脅壓迫的空間感。而主人翁被囚禁在四壁之中，渴望可以穿牆奔逃，但回顧茫然，卻又無處可去，終究只能退守到一方小小的公寓之中。最後「我」在公寓裡遇到一位賣淫的婦人，暗夜情慾波濤洶湧，而「我」也不由自主被吸納沈入這一墮落的黑洞。

在這篇小說中，林如稷注入了在中國傳統小說之中罕見的空間想像——人在其中化為空間性存有（*spatial beings*），並且積極參與了換繞在人周遭的空間性的社會建構，於是空間成為多層次的存在，而從物質化空間實踐的感知空間（*perceived space*）、訂為空間之再現的構想空間（*conceived space*）乃至於再現的生活空間（*lived space*），空間已然不止是具體的「物質」和抽象的「精神」認知這兩種選項而已，而是有了另外一個其他（*an-Other*）的可能，它既不屬於中心，也不屬於邊陲，而是存在於交界的曖昧地帶，具有不斷位移、游走的「中介」（*liminal*）性格。¹³故舉凡感官的觸覺、視覺、聽覺，皆經由主人翁而釋放湧噴，自我存在遂被放大到與公寓的空間等同，甚至擴散融入無邊無際的黑夜之中：「掙扎，掙扎，黑幕之下的爬蟲在抵禦，在掙扎。夜已是四合，烏沈沈，昏霧霧中間，只有風哭，雪笑，植物們歎氣，蟄蟲們寒噤。」¹⁴於是這些「窄而霉小」的出租公寓，唯一足以收容城市「零餘者」棲身的方寸之地，也儼然成了主人翁自我生命的投射：它空虛，卻又飽滿；它禁錮，卻又開放；它黑暗，卻又不斷流動著曖昧的光影，宛如一塊塊從城市之中獨自脫落下來的痂疤，組合起來，卻成為五四知識青年的集體命運。

而在公寓生活中獲得啓蒙，尋找自我的，還有淺草社的另一位重要成員：詩人馮至。1921 他考入北大預科，1923 年進入北京大學德文系，雖為學院的正式生，但他對於公寓的回憶，卻與沈從文相當接近：

我讀大學的時期，軍閥混戰連年不斷，北京時而死氣沈沈，時而群魔亂舞，可是北大所在的沙灘，北河沿一帶，則朝氣蓬勃，另是一番景象。尤其是

1990 年)，頁 82。

¹³ 關於空間的論述，詳見索雅（Edward W. Soja）著，王志弘等譯：《第三空間》（台北：桂冠圖書，2004 年），頁 1-29。其中「導言／旅程／序曲」中對於「第三空間」的定義。

¹⁴ 林如稷：〈將過去〉，收於魯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頁 101。

1924年至1926年，《語絲》《現代評論》《猛進》等週刊相繼問世，極一時之盛，每逢星期日早晨起來，便聽見報童們在街上奔跑叫賣。……可以說，不只是在教室內，更重要的是在教室外，構成了我思想的雛形，培育了我作人的態度和作文的風格。¹⁵

「教室外」的公寓不但匯聚了離鄉的青年遊子，也成為許多文藝刊物，乃至思潮的發祥傳播之地。而有類似經驗的，還有小說家胡也頻。1923年他從福建故鄉一路流浪來北京，落腳在西單堂子胡同內西牛角胡同四號的公寓裡，和項拙等朋友開始編輯附屬於《京報》副刊的《民眾文藝》。當時也才剛從湖南進京的沈從文，糊裡糊塗寄去了一篇稿子，竟成為他生平第一篇印成鉛字的作品。胡也頻帶著印好的刊物，親自到沈從文的「窄而霉小齋」慶華公寓去拜訪，從此奠定了兩人之間深厚的情誼。這情誼始終令沈從文念念不忘，他寫到：「只有在這種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裡，我才覺得那時幾個朋友的印象如何永遠潤澤到我的生活。」¹⁶

不久，胡也頻帶著丁玲去訪問沈從文，幾日之後，沈從文又回訪丁玲，才發現她當時也住在一個公寓：通豐公寓裡，而其環境之惡劣，竟和自己的「窄而霉小齋」相差不了多少：

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濕濕的發霉作臭的地，牆上有許多破破爛爛的報紙，窗紙上畫了許多人頭，便很覺得稀奇，以為一個女子住到這樣的房子裡，不害病，不頭痛，還能很從容的坐在一個小小的條桌旁邊寫字看書，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¹⁷

沈從文、胡也頻、丁玲三位年紀相仿的青年，從此結為莫逆，他們一同居住過北京的許多公寓，有時為了省錢，遠遷到郊區的香山，但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裡，他們更喜歡住在北京大學附近北河沿到沙灘一帶，如銀閘、中老胡同、孟家大院、景山東街、馬神廟，皆曾留下過三人的生命印記。¹⁸這些公寓中最富盛名的一棟，

¹⁵ 馮至：〈馮至自傳〉，《馮至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十二卷，頁56。

¹⁶ 沈從文：〈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4-10。

¹⁷ 同前註，頁7。

¹⁸ 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101。

當非「漢園公寓」莫屬。公寓主人黃嵩齡出身廣東，是清末舉人，康有為的弟子，他雅好文藝，對於從事文學創作的青年最是寬容，故在沈從文的記憶中，張采真、焦菊隱、于庚虞、王魯彥、顧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等等，皆曾經是「漢園」的房客。漢園公寓的青年們在 1926 年，甚至一同成立文學社團「無須社」，名字乃是由「未名社」而來，並且出版刊物，先是在《世界日報》附出《文學週刊》，由于賡虞擔任主編，後又交由北新書局印行「無須社叢書」等等。¹⁹

就在這段青年的公寓歲月裡，也正是沈從文和丁玲等人創作發光發熱的開始。1925 年 1 月，沈從文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小說〈公寓中〉，在小說末尾，他特別註明寫於「慶華公寓」，這應是沈從文第一篇在正式報章，而非同仁刊物上發表的作品，也是他進入現代文壇的第一塊敲門磚。「公寓」，正是這篇小說的場景，體裁則採取自傳日記體，在小說的一開頭，沈從文便破題寫道：「公寓中度著可憐歲月。藉著連續的抑鬱，小孩子般大哭，昏昏的長睡，消磨了過去的每一天時間。」²⁰只消短短幾句話，從「抑鬱」「大哭」和「長睡」，便道盡一個蝸居在公寓之中的「我」：「零餘者」的心境，也勾勒出一幅時代青年的圖象。

三、零餘者／浪人／漫遊者

沈從文就像林如稷，也將公寓形容成是一個宛如黑洞般，具有強大吸力的幽暗空間，是「無底心的黑暗澗谷一樣，只是往下墮」，²¹而沈落其中的主人翁，在奮力起身逃出公寓之後，也只能在胡同間來回無目的焦慮穿梭，直到精疲力盡為止，而除了公寓以外，「零餘者」茫茫然無處可歸。故困鎖在公寓之中，以及在北京胡同盲目漫遊的主題，在沈從文 1925 到 1927 年之間的小說中，可以說是不斷地反覆再現，而構成了他北京書寫的基調。類似的篇章共計有〈絕食以後〉、〈雨〉、〈棉鞋〉、〈松子君〉、〈重君〉、〈看愛人去〉、〈我的鄰〉、〈老實人〉、〈怯漢〉等等，它的內容皆相當近似，也一律如同郁達夫般具有濃厚的自傳色彩，主人翁顯然就是沈從文自己的化身，也一律住在「窄而霉小」的公寓中，一個由四壁「磚地上滑壘壘的，綠色浸潤於四角」所構築而成的牢籠，被公

¹⁹ 同前註，頁 128。

²⁰ 沈從文：〈公寓中〉，《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 351。

²¹ 同前註。

寓中的種種小物件，諸如：時鐘、布鞋、字典等環繞，閉鎖，而主人翁困居其中，充滿了嚙語幻想：

地毯的確已鋪在地下了，白鞋子不消說是早已無影無蹤。在腰圓形的大梳妝鏡旁，正有盆小小金桂開了許多簇攢著的小花，安置桂花盆子的，是一個約兩尺來高的檀木架子。床是值十二元的白木床，然而床上那條湖黃色綢被同一對挑花大鴨絨枕配置得極其相稱，故床也並不見得寒村。兩個人就併頭睡在那鋪床上，是夜間，電燈在綠絲綢罩下放光，房中空氣似乎也極溫暖。²²

但現實之中「窄而霉小」的公寓，卻是空空蕩蕩，唯有透過想像的打造，在瞬間才有了各式各樣現代物質環繞：梳妝鏡、桂花、檀木架、鴨絨枕、電燈、綠絲綢……。

現實中的一無所有，逼迫主人翁不得不逃出公寓，在胡同中無目的漫遊。在沈從文的北京城市之旅中，並沒有所謂的正統旗人「京味」，反倒是以一個異鄉浪人的眼光，生動捕捉二〇年代北京城市的風景。沈從文特別喜歡描寫西單牌樓、菜市場和商店街，如眼鏡公司、洋貨店、老鋪、茶葉店、零食店、糖果鋪……，乃至躲在胡同深處的妓女戶。舉凡食物：如糖炒栗子、醬肘子、油雞、奶油餅、寇寇糖，小玩意兒：如泥小豬、松花，或是行走在大街上花枝招展的女人，對他而言，皆是充滿了致命的威脅與吸引力。而置身在這一座街頭的商品博覽會中，他不禁要為之著迷，又羨又恨又嫉：

他承認這些是生在世界上應享受，應留戀，還可說是應玩賞的事物，尤其是單把濃嚴的香味跑進他鼻孔而本身卻懸掛到玻璃中的燒雞燻鵝。這些東西使他腿軟，使他腹鳴，使他由失望而憎惡而傷心。²³

透過「零餘者」視角看出的北京城，也宛如是一場喬治·巴塔耶（Bataile）所說的「誇富宴」（pot-latch），它排除了所有的交易，而其目的是在詆毀對手，使之蒙羞；而欲望帶有強行超越、侵犯某種被禁止東西的激烈度，也把一度被嫌惡的、畏懼

²² 見沈從文：〈重君〉，《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401。

²³ 見沈從文：〈絕食以後〉，《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361-362。

的狂暴之力重新帶回來。²⁴

我們可以根據這些上述作品，畫出沈從文的北京漫遊路線：沙灘、馬神廟、北海公園，或是西單牌樓、長安大街，皮庫胡同東頭到菜市，進手帕胡同到教育部街西端，出石駙馬大街，轉西，傍牆走，過女子師範大學門前。而如此漫遊路線，也唯有在一九二〇年代北京城牆拆除，脫離帝都架構，而將一條東西長安大街打通，²⁵轉型成爲一座開放給平民大眾的現代城市之後，方才有可能實現，而這也使得沈從文成爲北京轉型爲二十世紀現代城市之後的，第一代的漫遊者。但此「漫遊者」，卻非班雅明所說的波特萊爾式的漫遊者，因爲他既不從容悠閒，也不客觀疏離，²⁶反倒是一個寂寞、焦慮又緊張不安的「我」，以「零餘者」和「浪人」的身分漫遊，只能縮擠在街道的邊緣，自始至終是這一座城市所排斥的「他者」，而不是一個自在又自得的主人。²⁷於是城市的誘惑既在眼前，卻是又遙不可得，一切在瞬間便轉化成爲羞辱的經驗，最後主人翁只能狼狽逃回那座「窄而霉

²⁴ 見喬治·巴塔耶(Bataille)：〈耗費的觀念〉，汪民安編譯：《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喬治·巴塔耶文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1。以及湯淺博雄：《消盡——巴塔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七章。

²⁵ 1912年，左長安和右長安門城牆拆去，從此打通一條長安大街；1914年，正陽門拆除；1915年，德勝、安定、東直，朝陽門拆除；1917張勳復辟美夢粉碎，更加速城牆的改造。東皇城根向南一段，拆於1924年，向北一段，拆於1926年，直到1927年，北面皇城以及宣武朝陽城樓拆除後，城牆已經所存無幾。袁熹：《北京城市發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一章所述。又見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頁30-31云：「南，北長街，南北池子以及灰池，石板房諸處，昔為行人所不易至者，今具成為通衢孔道矣。」

²⁶ 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定義「漫遊者」為「遊手好閒者」，他超然又疏離地注視著他們身邊的世界。但顯然類似此種超然又疏離的漫遊姿態，鮮少出現在上海的書寫中，見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出版社，2000年)，頁36-43的討論。

²⁷ 董玥：〈國家視角與本土文化——民國文學中的北京〉，王德威、陳平原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頁249指出：在上海知識份子會有做「他者」的感覺，在北京他們則不會，因為在北京他們是主人，而北京的本地人才是他們眼中的「他者」。故董玥結論說：北京城中的「新知識份子」並不是像班雅明眼中的波特萊爾那樣的漫遊者，或城市閒人，因為他們不是人群中的詩人，他們甚至根本就不在人群中。換言之，班雅明「漫遊者」的理論是否適用在北京或上海的書寫中，值得商榷。

小」的公寓，並對公寓外的城市發出陣陣詛咒：「魔鬼的人群啊！地獄的事物啊。我要離開你，於是，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鴿籠般的溼霉房子中了。」²⁸

若再對照丁玲寫於 1928 年前後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以及〈自殺日記〉兩篇，則更會發現她與沈從文之間的相似，已經不只是兩人筆跡非常相似，曾經遭到魯迅誤認成是同一個人而已，就連他們彼此之間早期的作品，從題材，風格，濃厚的自傳性色彩，「零餘者」的漂泊流浪，公寓空間的閉鎖孤寂，乃至為情慾所煎熬的焦躁癡狂，都有驚人的雷同之處。就以〈莎菲女士的日記〉為例，全篇和沈從文的〈公寓中〉同樣採取日記體，也同樣以蝸居公寓中的青年作為主角，同樣被圍牆所閉鎖，而感官在此狹隘的四壁空間之中被放大，只是這一回，主人翁的性別由男性換成了女性「莎菲」：

電話也不斷的有人在電機旁大聲的說話。沒有一些聲息時，又會感到寂沈沈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堊的牆。它們呆呆的把妳眼睛擋住，無論你坐在哪方，逃到床上躺著吧，那同樣的白堊的天花板，便沈沈地把你壓住。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厭的心的：如那麻臉夥計，那有抹布味的飯菜，那掃不乾淨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臉台上的鏡子……²⁹

丁玲的女主角皆是外表蒼白虛弱，但是內在卻高漲著一股非理性的瘋狂激情，時而爆發出美杜莎（Medusa）式的狂笑。³⁰故〈莎菲女士的日記〉最成功的地方，應不在於描寫情慾尺度的裸露、大膽，而是在於將情慾揉合入公寓空間的窒息之感，字裡行間瀰漫瑣碎且無意義的瘋狂，以及面對死亡無所畏懼的陰鬱想像，而她亦與西方文學「閣樓上的瘋婦」不同，因為「莎菲」乃是為「零餘」的漂泊處境所困，而非傳統婦職或是家庭倫理的枷鎖。

丁玲筆下的「莎菲」，也與林如稷或是沈從文筆下的主人翁如出一轍，他／她從公寓中逃出來，拖著病體，在黑魘魘的胡同內焦躁奔走，甚至不斷遷徙公寓的住處，一會兒從西城搬到北京大學旁的大元公寓，一會兒又渴望遠行，搬到郊

²⁸ 沈從文：〈絕食以後〉，《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 362。

²⁹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三卷，頁 42。

³⁰ 見簡瑛瑛：〈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新女性形象〉，收入張小虹編：《性／別研究讀本》（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年），頁 151。

區的香山去，但卻又捨不得離開這熱鬧的北京，她的心中充滿了莫名的不得其所的焦慮，以及一股不得不「行」的渴望：

我想把什麼東西都摔破，又想冒著夜氣在外面亂跑，我無法制止我狂熱的感情的激盪，我躺在這熱情的針氈上，反過去也刺著，翻過來也刺著，似乎我又是在油鍋裡聽到那油沸的響聲，感到渾身的灼熱。³¹

丁玲寫出了一代青年焦躁浮動的心，遊走在疆界內外，總是不能安適其位，卻也因此充滿了對於「線／限」(la linea)的顛覆挑釁，並且展現空間所包涵的矛盾而多重的心理意義。³²

至於胡也頻的〈黎蒂〉則形同是〈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翻版，「黎蒂」便是丁玲的化身，也是「莎菲」的寫照。胡也頻描寫一個驕傲又特立獨行的青年女子，蜷縮在公寓中，只能透過不斷的書寫，來尋求自我的安頓：

涼風吹進窗櫺，送來了瀟瀟瑟瑟的秋雨消息，於是她丟下筆兒，無力地斜躺在椅上，淒慘地狂吟著——戚戚秋林細雨時，天涯漂泊欲何之？熱烈地奔流的眼淚，便落滿了她的臉上和胸襟。³³

也因此，這些青年們作品多與現實相互呼應，甚至彼此之間多交相指涉，具有強烈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可以互為解釋，援引生發，而參照對映之餘，更能透露五四「零餘者」青年間命運的共通特質，以及他們在彼此身上照映肯定自我，但同時卻也自我懷疑，只能訴諸否定的死亡，來作為救贖的途徑。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一篇應是公寓「零餘者」書寫的高峰，最後，莎菲只能和沈從文小說中的主角一樣，投入死亡的懷抱，以求取最終的平靜。又如〈丁玲〈自殺日記〉一篇，便與沈從文〈重君〉相彷彿，女主角伊薩被公寓沙發、果皮、骯髒衣物、紙屑、床褥所環繞，而只能依靠文字，酒精乃至死亡來獲得救贖，打開精神上的出口。諷刺的是在小說的結尾，這本塗滿了喃喃囈語的死亡日記本

³¹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全集》，第三卷，頁75。

³² 見索雅(Edward W. Soja)著，王志弘等譯：《第三空間》，頁173。

³³ 胡也頻：〈黎蒂〉，《胡也頻小說精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頁425。

卻被當成了抵押品，送給了前來討房租的房東。丁玲將這些女性特有的纖細感性，失愛的狂躁，時而挑釁，時而沮喪，時而疑惑，時而浪漫，時而冷酷，又時而癡狂的矛盾面向，展現得淋漓盡致，也使得她在這方面的成績，似乎要更勝沈從文的作品一籌。

除了公寓和胡同、公園，尤其是北海公園，也是經常出現在五四小說之中，「零餘者」和「浪人」漫遊的北京空間，一如郁達夫筆下東京的上野公園。公園，在現代城市空間中所扮演的意義，頗堪玩味，它所營造的大自然氛圍，有如現代文明理性壓抑之下，一個感性與野性的出口。而北京的北海公園，本是皇家專屬園林，始建於遼代，也是迄今世界尚存最早的皇家園林，在 1911 年民國成立後，本將北海公園劃為溥儀的私人財產，直到在 1925 年後才改為公園，正式對大眾開放。從此，北海公園便成為北京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間，頻頻出現在二〇年代中葉以後的小說中，而成為「零餘者」漫遊的重要去處。譬如沈從文的〈老實人〉，描寫在北海公園跟蹤女人的自寬君，便和丁玲〈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中一男一女在北海公園的情愛追逐，情節場景皆相彷彿。而類似的作品，還有盧隱 1931 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象牙戒指〉，也是描寫居住在西安公寓的主人翁伍念秋，逃出公寓之後在北京城市漫遊，而其漫遊路線與沈從文竟幾乎一致，也是以中央公園，北海公園，西長安街和東安市場組成的北京地圖。

從公寓入胡同，再入公園，如此漫遊路線，以及不得不「行」焦躁渴望，在二〇年代五四青年的身上是如此之強烈，例如沈從文在〈公寓中〉便藉由一場與現實相混淆的夢境，寫道自己：

為什麼目的而走呢？我也不知道，只是盲目的走，無意志的前進。這不是我一種生活的縮影是什麼？我知道，我如今還是走著，我還是夢一般走著。³⁴

從林如稷、沈從文、丁玲，到盧隱等，不斷書寫一個個「流浪無所歸宿的人」，行走在「失了國際畛域，中西共治的北京城」。³⁵而他們彼此之間書寫的體裁和題材，皆是如此的近似，可以說是一股時代的風潮，但卻也反映了當時青年的集體圖景：

³⁴ 沈從文：〈公寓中〉，《沈從文全集》，第一卷，頁 356。

³⁵ 同前註，頁 359。

徘徊城市的異鄉人，他們閉鎖在公寓之中，以及徘徊在胡同和公園的身影，組成了中國二十世紀第一批的城市漫遊隊伍。

四、從「零餘者」到革命青年？

1925年，正當沈從文以一個來自異鄉的「零餘者」角度，埋首書寫北京公寓的浪人生活時，一個日後被視為正宗京味，真正代表北京旗人作家：老舍，正遠在倫敦求學，而成爲另一座大城市的異鄉客。這時老舍回過頭去寫自己的故鄉：北京，也就是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趙子曰》。《趙子曰》就像沈從文的〈公寓中〉，一樣以二〇年代北京的學生公寓作爲小說的主要場景，但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視角，一位真正的北京在地人，置身在公寓中，卻變成了格格不入的局外者。

《趙子曰》的故事就發生在老舍曾經居住過的，位在北京北河沿上方，鐘鼓樓後面的「天台公寓」。小說一開頭，老舍仔細地描摹公寓的空間：「天台公寓門外的兩扇三尺見長，九寸五見寬，賊亮賊亮的黃銅招牌，刻著：『專租學員，包辦伙食』」，而公寓總共有二十間客房，卻擠進了三十個人，總共被截作內外兩個院子，內外中間隔著一段粉板牆，上面彩畫著一些《聊齋誌異》的人物鬼狐。³⁶有趣的是，在老舍的筆下，公寓也宛如是一個《聊齋》般人鬼狐魍魎不分的世界，而居住其中的學生，絕大部份就如同沈從文、丁玲等人，是在大學旁聽「不要文憑學位」的知識分子，他們每天不是在公寓中高談闊論，就是「大鬧公園」，逛東安市場，鬧學潮，或乾脆在大街上無事漫遊，他們恨不能將這座城市推倒，拆爲平土：

有時候，他（莫大年）停住腳呆呆的看著古老的建築物，他恨不得登時把北京城拆個土平，然後另造一座比紐約還新的城。自己的銅像立在二千五百五十層的樓尖上，用紅綠的電燈忽明忽滅的射出：「改造北京之莫大年！」³⁷

《趙子曰》可說是寫盡了五四之後學潮的醜態，與荒唐亂象，老舍極盡諷刺之能

³⁶ 老舍：《趙子曰》，收於《老舍小說全集一》（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203-204。

³⁷ 同前註，頁241。

事，甚至將學生和軍閥相提並論：

新社會裡有兩大勢力：軍閥與學生。軍閥是除了不打外國人，見著誰也值三皮帶。學生是除了不打軍閥，見著誰也值一手杖。於是這兩大勢力並進齊驅，叫老百姓們見識一些「新武化主義」。³⁸

顯然他是站在五四行列之外，一個冷眼的旁觀者，就如同他日後在〈我怎樣寫《趙子曰》〉中的自白：他「因自幼貧窮，做事又很早」，早在 1918 年五四運動到 1924 年之間，他就已經在位於方家胡同的高等小學任校長，因此得以住在《趙子曰》中所描寫的鐘鼓樓一帶公寓，也因此對於彼時的青年，有了親近的觀察。然而，老舍卻始終對這些青年保持高度的懷疑，疏離，他坦言：「『五四』把我與『學生』隔開。我看見了五四運動，而沒在這個運動裡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沒和教育事業斷垣，可是到底對於這個大運動是旁觀者。」³⁹

分明是北京在地人，如今卻反倒成了「局外人」、「旁觀者」，這也使得老舍的小說置放在二〇年代的北京書寫，乃至五四文學的行列之中，顯得特別的世故早熟，更不如沈從文、丁玲、胡也頻乃至盧隱等人，以郁達夫式漂泊孤寂的「零餘者」，作為自身的寫照。故老舍小說少了幾分自哀自憐，多了一股嘻笑怒罵，以及疏離的批判，更提供我們一個觀看二〇年代北京公寓青年不同的視野。

正如前文所說，二〇年代的北京乃是一個以異鄉青年為主導的城市，故老舍這一在地者的批判聲音，反倒略顯的刺耳。而這一局勢在 1928 年後，因戰爭紛擾，文化人，知青及出版業皆從北京移往南方上海之後，出現了轉變。北京公寓的「零餘者」們去到南方，開始產生了態度上的轉變，而胡也頻是其中轉變得最早，也最清楚的一位，而這也是他與摯友沈從文分道揚鑣的開始。

1928 年，胡也頻和丁玲追隨沈從文的腳步，離開北京去到上海。在南方他受到社會主義的啓發，開始有了迥然別於過往的風格。1929 年，胡也頻開始寫作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雖然彼時人已身在南方，但他卻回過頭去書寫北京的過往，換言之，在〈到莫斯科去〉這篇小說中，他重新修正了他的北京歲月，也衍

³⁸ 同前註，頁 257。

³⁹ 老舍：〈我怎樣寫《趙子曰》〉，收於胡絮青編：《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香港：三聯書店，1981 年），頁 12-13。

佛是在對昔日沈溺在「零餘者」哀傷的自我，進行一場反省批判，甚至再造。他描述公寓（大明公寓）中一群只關心戀愛和性交的青年，被一位從南方回來，受到共產黨思想洗禮的青年：洵白所啓蒙，故女主角素裳一洗過去的消極耽溺，拋下了原本愛不釋手的《馬丹波娃利》（即《包法利夫人》），而毅然投身革命，最後馬車從大明公寓出發，奔向遙遠的莫斯科。⁴⁰

從公寓到莫斯科，「零餘者」儼然搖身一變，成爲了革命青年。而在沈從文的回憶之中，丁玲最稱道也最喜愛的小說，便是《馬丹波娃利》，⁴¹所以胡也頻〈到莫斯科去〉的素裳，不無重寫北京公寓中的〈黎蒂〉，也就是丁玲和「莎菲」之意。而 1929 年卻也正是丁玲在寫《韋護》的時候，「韋護」乃是以瞿秋白作爲人物的摹本，也不禁讓人聯想到胡也頻〈到莫斯科去〉中那來自南方的，共產黨知識青年「洵白」。但相較於丁玲，胡也頻投入革命，來得更早也更堅定。於是他又以中篇小說〈光明在我們的前面〉，重寫了他和沈從文、丁玲所曾經一同親身經歷過的，1925 年的北京城。不同於老舍《趙子曰》中只會鼓動學潮，盲目造反的學生，也不同於沈從文〈公寓中〉系列那自哀自憐，被死亡和情欲所困的「零餘者」，胡也頻〈光明在我們的前面〉描述北大旁馬神廟的「大同公寓」和「三星公寓」青年：

公寓裡突然變了一個異樣的景象了。許多學生把畫報釘到牆上去，彷彿每個人都需要這畫報中的死者——那霉爛的屍身，那槍洞，那血，那殘酷的帝國主義的罪惡，來刺激這跳動於熱血中的青年的心。……全公寓的學生的房子裡，都釘著這樣的一張。有的還在這畫報旁邊寫了血淋淋的字，表現那鼎沸的熱情和強烈的意志。⁴²

如此熱血沸騰的知識青年，一改昔日零餘者／浪人／漫遊者的蒼白消極，轉而充滿了強大的鬥志，積極投身改造社會的革命。胡也頻以此改寫了他自己，也改寫了他昔日公寓摯友們的形象，或者更準確地說，以此爲那些漫遊無所依歸，困鎖在公寓中的「零餘者」們，打開了一條可能的出路：革命。

⁴⁰ 胡也頻：〈到莫斯科去〉，《胡也頻小說精品》，頁 12。

⁴¹ 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全集》，第十三卷，頁 82。

⁴² 胡也頻：〈光明在我們的前面〉，《胡也頻小說精品》，頁 166。

而這條出路在三〇年代以後，吸引越來越多的青年投入，「零餘者」逐漸化身成爲「革命家」。1931年，胡也頻被國民黨槍決，成爲左聯五烈士之一，而丁玲也毅然加入革命的隊伍，宣誓向昔日的「莎菲」告別。沈從文則是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以牧歌情調的《邊城》，尋找中國文明在現代化過程中搖擺前進的，另一種可能。即使日後這批五四青年們各自有了不同的文學主張，然則在生命的底層，維護「個人」之獨立自主，仍是這一代不疑的信念，以及精神標誌。而這或許正可回溯到這些創作者的文學啓蒙之地：二〇年代北京城市開放的空間，以及公寓「零餘者」的漫遊生涯，所奠基下來的對於自由之信仰，乃至對於一代人氣質上深深的潛移與默化。

引用文獻

-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三卷。
- 老舍：〈我怎樣寫《趙子曰》〉，收入胡絜青編：《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香港：三聯書店，1981年。
- _____：《趙子曰》，收入《老舍小說全集一》，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
- 李歐梵：《上海摩登》，香港：牛津出版社，2000年。
- 沈從文：〈公寓中〉，《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
- _____：〈絕食以後〉，《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
- _____：〈致唯剛先生〉，《沈從文文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十一卷。
- _____：〈重君〉，《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一卷。
- _____：〈記丁玲〉，《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十三卷。
- _____：〈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十三卷。
- _____：〈郁達夫，張資平及其影響〉，《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十六卷。
- 林如稷：〈將過去〉，收入魯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台北：業強出版社，1990年。
- 胡也頻：〈光明在我們的前面〉，《胡也頻小說精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
- _____：〈到莫斯科去〉，《胡也頻小說精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
- _____：〈黎蒂〉，《胡也頻小說精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
- 胡適：〈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收入李敖編：《胡適選集》，台北：李敖出版社，2002年，第四卷。
- 郁達夫：〈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晨報副刊》，1924年11月16日。
- _____：〈血淚〉，《郁達夫小說全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年。
- _____：〈寫完了《蔦蘿集》的最後一篇〉，《郁達夫小說全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年。

- _____：〈懺餘獨白〉，《郁達夫小說全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年。
- 袁熹：《北京城市發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 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 馮至：〈馮至自傳〉，《馮至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十二卷。
- 董玥：〈國家視角與本土文化——民國文學中的北京〉，收入王德威、陳平原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2005年。
- 趙園：《北京：城與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魯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台北：業強出版社，1990年。
- 簡瑛瑛：〈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新女性形象〉，收入張小虹編：《性／別研究讀本》，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 喬治·巴塔耶（Bataille）：〈耗費的觀念〉，收入汪民安編譯：《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喬治·巴塔耶文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索雅（Edward W. Soja）著，王志弘等譯：《第三空間》，台北：桂冠圖書，2004年。
- 湯淺博雄：《消盡——巴塔耶》，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usek）著，李燕喬等譯：〈中國文學中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

The Superfluous Man / Wanderer in the Apartment: the Bei-jing City Space in the May Fourth Fictions

Hao, Yu-hsiang*

[Abstract]

In the 1920's, the living spaces occupied by the new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transformed from "Hui-kuan" to "Gong-yu" apartment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how, aft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cancelled by the Qing Dynasty in 1905, the new Chinese intellectuals rose abruptly from the modern universities and the student apartments surrounding the university campuses. The new intellectuals engaged in creative writing and expounded new ways of thinking and a modern way of living that was influenced by their life in the apartments. The living space of the apartments was reflected in the works of young writers like Yu Da-fu, Lin Ru-gi, Ding Ling, Shen Chuan-wen, and Lu Yin who were struggling to make a living as they tri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life in a big city. Therefore, the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works of the May-Fourth writers is mostly that of a young lonely stranger, a shadow, wandering through the "Hu-tong" and parks of Bei-jing. Bei-jing in the 1920's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city for the enlightened young gener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city walls opened the city spaces and became the inspiration to a generation of young writers who turned a new page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Keywords: May-fourth, Modern Fiction, City, Bei-ji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